楚人的酒艺与风尚

王晓珂

淮南武王墩墓出土了一件青铜壶，是出土文物里极少见的器皿，造型优美，像精致的酒壶，有两个耳环，壶盖上一只飞鸟，壶上简洁的图案，如系了三道绳子一般。这种铜器应是盛酒的器皿。同时，在武王墩墓中还出土一件精致的青铜挹勺，这种器皿主要用于挹取酒浆，常与壶、樽等储酒器配套使用。

在周代各国中，数楚国饮酒的风气最盛，先秦文献中记载楚人饮酒的较多。

春秋时期著名的“召陵之盟”，源于齐桓公与管仲曾因楚国的“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无以缩酒”而兴师问罪。“周成王盟诸侯于岐阳，楚为荆蛮，置茅，设望表，与鲜卑守燎，故不与盟。”茅蒐是古代朝会与祭祀时，立于神前的成捆的青茅草，又称包茅、苞茅。祭神时，将酒浇洒于包茅上，酒渗而下，如神饮酒，故称“缩酒”。包茅是一种茅草。周王责成楚国进贡，而楚国不愿进贡，其原因是周王要楚贡包茅以缩酒，是把楚国当成次等诸侯，只能与鲜卑等小国干些杂役之类的事，不能参与诸侯之盟。楚国感到受到了侮辱，于是便不肯上贡。包茅缩酒的祭仪，宋代仍袭用。黄庭坚《宫亭湖》有诗曰：“栾公千岁湖冥冥，白茅缩酒巫送迎。”

也有一种说法，包茅缩酒，解释为楚人在酿酒时所采用的用茅草覆盖酒糟、增温发酵的一种技术，用以说明楚人善于酿酒。

酒文化在楚国甚有影响：宴会与祭祀必用酒。春秋时期，楚国令尹蒍罢出使晋国，晋君设宴招待，他在宴会上赋诗“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”表示感谢。

楚庄王举行庆功宴，饮酒甚多，以致个别武将失态，乘灯灭时调戏王妃许姬。庄王为了消除参宴者的紧张心理，就在觥筹交错时，绝缨痛饮。观射父对楚昭王说：“百姓夫妇，择其令辰，禋其酒醴，以昭祀其先祖。”楚国规定行军作战不得饮酒。晋楚鄢陵战前，司马子反先是竭力戒酒，后被其仆人所惑，把酒当茶喝了，以致酩酊大醉，楚共王召他议论军机，他仍烂醉如泥，贻误军国大事，自杀而死。观射父所说的“醴”，是一种甜酒，类似今日的糯米伏汁酒。而子反所饮的酒，就是一种度数甚高的烈性酒了。可见楚人当时能酿造低度与高度酒。

屈骚中提供了一些有关楚国酒的资料。《渔父》中屈原说：“众人皆醉而我独醒。”渔父劝他：“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世人皆浊，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？何故深思高举，自令放为？”这说明了楚人酿酒要去糟，要过滤。《诗·小雅》说“以竹筐滤酒曰釂。”《骚》中还有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”“奠桂酒兮椒浆”“餐六气而饮沆瀣兮”，“吸飞泉之微液兮”等诗句，这说明楚国一是重视酿酒的水，如木兰朝露、飞泉微液等，二是以植物入酒，如兰、桂、椒等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在生产传统名酒的同时，又发明、酿制出了一些饶有楚地特色、合乎楚人口味的新酒品种。《招魂》在铺陈美酒时云：“胹鳖炮羔，有柘浆些。”“瑶浆蜜勺，实羽觞些。”“华酌既陈，有琼浆些。”浆，通常指的是解酒、助酒的甜饮料。柘浆，指的是甘蔗汁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“泰尊柘浆析朝醒”，应劭曰：“取甘柘汁以为饮也”。瑶浆和琼浆，清胡文英《屈骚指掌》分别解以白酒和红酒。今按《招魂》所述，瑶浆盛于“羽觞”，琼浆盛于“华酌”。觞，又名觚，即酒杯；酌，是从酒樽中提酒用的酒斗。由此可见瑶浆和琼浆均是接近于酒类的饮料，而不是纯粹的甜水。又，盛琼浆的“华酌”，华也就是花，五臣即云：“华酌，谓置花于酒中。”看来，“琼浆”当是掺入了桂花一类芳香型植物花朵的甜酒。

楚人的酿酒技术流传不衰，唐代称楚酒为“楚醪”，李商隐奉使江陵有“不遣楚醪沉”句，罗隐诔杜工部墓有“紫菊馨香覆楚醪，奠君江畔雨萧骚”之句。

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件冰(温)酒器，这种器物是由两种容器组合而成，里面的方壶形容器是盛酒的，每个方壶中均有一把铜勺，外面的方鉴形器在夏季里用来盛冰或凉水，在冬季则用来盛热水。冰(温)酒器的出土证实了《招魂》的记载：“挫糟冻饮，酎清凉些。”又据《大招》“清馨冻饮，不歠役只”也是说的在夏季饮用冰冻的“泛齐”类低度米酒。于省吾在《释四方和四方辛的两个问题》一文中说：“楚辞《大招》的‘清馨冻饮，不歠役只’，役字旧均不得其解。实则役应读为烈，烈谓酒之酸厚酷烈者。这是说，以清淡馨香凉爽之酒为饮，而不歠其酷烈者。”此说甚是。在夏季饮用低度甜酒是符合饮食卫生的良好习惯，但对于楚人来讲，饮用低度酒又似乎是一种偏好。

朱熹《楚辞集注》曰：“酎，三重酿酒。秦《月令》曰：‘春酿之，孟夏始成。’”清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介绍“酎酒”的酿造方法说：“《广韵》作‘三重酿酒’，当从之。谓用酒为水酿之，是再重酒也。次又用再重之酒为水酿之，是三重之酒也。”四酎，则是以三重之酒为水再酿而成的度数很高的醇酒。“不涩嗌只”，楚人酿造的“四酎”酒入口感也甚佳，味道清醇、爽口。如果楚人不掌握熟练高超的酿酒技艺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。《大招》还提到一种楚国名酒：“吴醴白蘖，和楚沥只。”王逸注曰：“再宿为醴。米曲也。”“沥，清酒也。言使吴人酿醴，和以白米之曲，以作楚沥，其清酒尤醲美也。”清酒也是度数很高的一种酒。它冬酿夏熟，色清味浓，而以吴国的酿醴(甜酒)为水，和以楚国的白米与酒曲酿造出的这种清酒——楚沥，自然更是别具一番风味了。

据传世彝器铭文载，楚国王室的酿酒机关名为“集醪”。《三代古金文存》卷三著录安徽寿县出土铸客鼎铭文曰：“铸客为集醪为之”。陈秉新《寿县楚器铭文考释拾零》说：“集醪读为内酋，是楚王室司酿之所，其长相当于《礼记》的大酋。”楚国出产的各色名酒当主要是由“集醪”机构内的世职工役酿造出来的。

直到今天，我国的许多名酒，大部分出产于荆楚故地和与荆楚关系密切的巴蜀云贵地区，如贵州的茅台，四川的泸州老窖，湖北的白云边、黄山头、园林青等，这不能说与楚国的酿酒技术毫无渊源。看来酒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“活灵活现”的龙虎纹尊与商代淮南方国

周 强

典说淮南历史 第一季

1957年6月，在阜南县朱寨镇润河中发现8件商代青铜酒器，其中尊、罍、觚、爵各2件，均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龙虎纹青铜尊高50.5厘米，口径44.9厘米，腹深41.5厘米，足径24厘米，重26.2公斤。国博官网介绍说，龙虎纹青铜尊是商代淮夷器物，“器口侈大，直径过肩，颈部较高，下部收缩，呈大喇叭状。肩部微鼓，下折为腹，呈弧形收敛成圜底，圈足，上饰十字镂空。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，圆雕龙首，探出肩外，活灵活现；腹部以云雷纹为地，装饰三组虎食人纹，寓意诡秘；圈足饰饕餮纹。整器工艺精湛，花纹线条洗练，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”，介绍中使用了“活灵活现”这个成语。“活灵活现”问世较晚，在明代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卷五和凌濛初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十四才相继出现。

阜南县出土的两件铜尊中，另一件兽面纹青铜尊收藏在安徽博物院，是省博的镇馆之宝之一。兽面纹旧称饕餮纹，是青铜器和玉器上的常见纹饰，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。一个地方同时出土龙虎纹和饕餮纹的青铜器非常罕见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姚尚书《淮南历史漫步》(黄山书社)《“淮夷”与淮夷文化》篇认为，“商代，以寿州淮南为中心的地域为淮夷人的活动区域，称‘虎方’，又有‘虎方淮夷’之称。虎为淮夷人的图腾，饕餮为殷商人的图腾，龙虎尊显然属于‘淮夷’人的文明产物……这些出土文物证明，早在殷商时期，‘淮夷’人的文明程度可与殷商比美”。由此看来，两件青铜尊也“活灵活现”地展示出商代淮夷文明的高度。

虎方是殷墟甲骨文中出现的商代方国。商朝自盘庚迁殷之后，政治局势趋于稳定，经济文化也有较大发展。高宗武丁即位后，任用傅说为相，商王朝大治，诸侯归附。为了开拓疆土，武丁不断对外用兵，虎方是其用兵对象之一。综合甲骨文记录的碎片化的虎方资料分析，虎方最初是商朝属国(“乙亥卜，贞令虎追方”，意即商王令虎方追击敌方)，后来虎方叛商(“贞令望乘及舆途虎方。十一月”，意即商王令望乘和舆两员大将征伐虎方)，虎方被征服后重新臣属于商(“虎入百”，意即虎方贡纳一百块龟甲)。

虎方于商朝末年至西周初期依然存在。周昭王青铜器中方鼎和中觶铭文中有“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”。“中”是青铜器主人，曾跟随昭王南征伐楚；觶是盛酒礼器。

关于商代虎方的具体地望，学界一直有湖北汉北、江西赣鄱、安徽江淮等争议，其中持安徽江淮说法的较为权威。比如郭沫若《中国史稿(第一册)》(人民出版社)说，“武丁征伐过的方国部落很多，其中较重要的还有……江淮流域的虎方”。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地图集》“商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”图，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“商时期中心区域图”和“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”都将虎方标于寿县瓦埠湖以东和长丰县以南地带，说明虎方是商周时期淮南市域内的一个方国。

夷虎是春秋时期的一支淮夷部落，仅从字面上理解，感觉应该与虎方具有传承关系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公元前491年夏，“楚人既克夷虎，乃谋北方”。北方指谁？就是两年前迁都州来的蔡国。蔡国本来是楚国的传统盟友，蔡昭侯因不堪楚国欺凌，在吴国协助下迁至淮南。为惩戒蔡国，楚昭王出兵攻灭夷虎，从南面对蔡国进行包围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春秋“楚吴越图”将夷虎标在商和西周时期虎方的同一位置。

甲骨文中还有虎侯，与虎方不是一个方国。虎侯为商王重臣，是商王朝的“王众”，领地在王畿之内，商王也经常到虎地视察。商王廪辛、康丁时，西部方国部落不服商王朝统治，商王“征调卫、虎、受等十几族‘王众’出戍，但始终没有把西部方国部落的反抗完全镇压下去”(郭沫若《中国史稿》)。

商代淮南市域内还有一个方国叫林方，曾遭受商王帝乙、帝辛的征伐。根据殷墟卜辞，林方最初臣属商朝，商王与其通婚。后来林方反叛，商王前往镇压。陈梦家《殷虚卜辞综述》(中华书局)认为，“林方在淮南，为淮夷之邦”。

韩美林与淮南第一家冷饮店

高振中

田家庵老北头 趣闻轶事

上世纪70年代的田家庵，夏季只有淮南肉类加工厂和淮南食品厂生产冰棒，小商贩从那里买了装入小木箱，跨肩背着穿街走巷，手拿一个在竹节上钻孔、从孔里系上绳拴着衣扣子的圆板，一路摇晃着“吧啦吧啦”的响声。于是家里人脚踩“咔啦咔啦”的“趿拉板”，对着响声喊道：“快来，我要买几支冰棒！”再加上夏天那不知疲倦的“知了知了”的蝉鸣声，那浓浓的市井烟火味儿，在满城弥漫散开。

1977年，对我们家来说是“否极泰来”：父亲的右派问题被平反了，抖落了多年的精神枷锁，更是全身心投入工作。他在全市首创将过去的散装糕点改为盒装出售，还在全省行业会议上介绍经验、获得奖励，品牌一度在淮南食品行业颇具影响力。

在合肥开会期间，看到省城的冷饮店生意很好，父亲向单位建议，在工人电影院广场的北侧畅园食品厂的商店划出4间房装修成冷饮店。父亲选“沁园”为店名，与毛主席《沁园春·雪》词中北国风光的冰凉世界相呼应，寓意给炎热的夏天带来清新凉爽的一方天地。

“沁园冷饮店”是淮南市第一家大规模的冷饮店，位于淮滨商场和前进商场之间，又有电影院人流的支撑，选址和硬件堪称首屈一指，但如何装饰冷饮店却让父亲费尽心思。

我曾在前进商场做过木匠，知道商场对装饰橱窗十分重视，美工每年到上海观摩，带回新景观、新面貌。我还配合美工做过橱窗布景，请在淮南创作雕塑《军民鱼水情》的周老师，雕塑了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“吴琼花”的舞姿，在电动机牵引下不停转动，吸引顾客驻足观看。可见商场对装饰美化用尽了心思。

父亲创意兴办这个冷饮店，契合当年改革开放后新潮消费的背景，也适应那个时代人们精神享受的需要。父亲想让淮南市第一家冷饮店与众不同，他通过多方联系，终于请来了当时已经“解放”了的著名画家韩美林。两个人共同的经历让他们谈得很投机，今昔对比，不胜唏嘘。

面对四壁空旷的白墙，父亲与韩美林商量，是画些山水、还是人物，亦或是结合改革开放的形势画些宣传画。

韩美林看着店里有五个墙面，略一思索便建议道：“现在改革开放，农村有了新面貌，就画‘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’这五个主题。”

“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”五个主题用什么画面来表现呢？大家有些纳闷，纷纷围过来看画家如何创作。

那时条件有限，没有画画的宣纸。只见韩美林先用羊毛排笔蘸上水，刷在绘图纸上——绘图纸比较厚，刷上水后纸就略有湿润，颜料画上去便会洇染，从而产生宣纸晕染的效果，这也是韩美林“穷则思变”的独创。然后他将颜料挤在画盘里，配好色彩，用画笔大开大合地在纸上挥洒起来，几乎三、五分钟就画好了一幅画，信手渲染创作了“牛、猴、马、鸡、鱼”动物变形张贴画，对应“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”。那流畅的线条、丰富的色彩、活泼的神韵，以及风驰电掣般的挥笔速度，扑面而来亮丽亲和的画风，令父亲和周边的人们赞不绝口。

有的说：“真是成竹在胸、意在笔先。”也有的说：“这速度比‘关公温酒斩华雄’还要快！”更有人赞叹：“这些画太有气势，周边电影院的宣传画怎么能比得上。”

韩美林与父亲相谈甚欢，父亲请他为家中写两幅字。韩美林爽快地答应了：“都写毛主席诗词吧。”父亲说好。韩美林首先写了一幅行书条幅：“十六字令·三首：山，快马加鞭未下鞍。惊回首，离天三尺三。山，倒海翻江卷巨澜。奔腾急，万马战犹酣。山，刺破青天锷未残。天欲堕，赖以拄其间。”

“再写一幅横幅吧。”韩美林又写了一幅篆字“红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为桥。”(摘自毛主席七律《送瘟神》)。题款时韩美林突然发现少写了一个“意”字，于是对父亲说：“这幅篆字我很满意，从书法作品的艺术审美意义上看，少一个字可以补救。”于是提笔在横幅左侧写道：“着字后夺意，美林手冷之事也。”

说来也巧，韩美林真与沁园冷饮店有缘。2022年韩美林重回淮南，见到90多岁高龄的原瓷器厂保卫科的马骏科长，两人相见抱头痛哭。韩美林说：“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的韩美林！”那时马科长的家就在冷饮店北面的家属院，家中瓦房与冷饮店几乎一墙之隔。马骏科长的爱人马慧清与我母亲是安庆老乡，都是市一院的同事。马骏、马慧清夫妇是热心人，对我们家热情帮助。韩美林在回忆文章中说：“马科长对我雪中送炭，是少数敢暗中帮助我的人。”

还有照顾过韩美林的淮南看守所警察陶世良。1984年我调入淮南外经贸局，他是政工科负责人。这个浙江人，性格严谨沉稳，言语不多。当年对只有72斤的韩美林非常照顾，以带其就医的名义，多次带他到田家庵老北头百货公司附近的小吃部，吃了很多地方土菜，据说“木须肉”等菜肴韩美林至今难忘。

韩美林在淮南的14年，历经牢狱、劳动、平反、重生，犹如凤凰涅槃。2022年韩美林到淮南时曾无限感慨：“当年在这里的日子真不好过。也正是那些苦难、羞辱，成了我人生的动力，塑造了现在的韩美林。这儿，是我艺术起飞的地方。”

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“韩美林80周岁艺术展”开幕式上，韩美林特邀马骏、陶世良赴京，并在发言中提到这两个淮南人。在困境中被人拉了一把，刻在骨子里终身难忘。韩美林的艺术创作，深深藏着淮南岁月的密码。

人性恻隐难得啊！马骏、陶世良。

重情重义珍贵啊！国之大师韩美林。

如今的田家庵，“沁园冷饮店”早已随着城市更新了无踪迹。我和孙女说起50年前冷饮店的故事，生活在幸福里的她似懂非懂。但说起在黑暗隧道里的那一束光、荒野沙漠里的那一壶水、冰天雪地里的那一团火、苦难压抑日子里的那一双手——这些温暖、动人又带点传奇色彩的事，让我们爷孙俩的眼里都有了泪花。

楚文化大家谈（第四季）征文

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

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藏战国暗花纹嵌松石剑初考

贾丙广

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展陈中，一柄2011年出土于寿县古城西南郊西圈遗址6号墓的战国暗花纹嵌松石剑，静静诉说着跨越时空的历史风云。这柄剑剑身与漆木剑鞘保存完好，剑格以绿松石镶嵌出精美纹样，剑身满饰的暗花菱格纹尽显越国剑的独特工艺。它不仅是战国青铜剑中的精品，更因与越王勾践剑的高度相似，以及在楚地寿县的出土背景，成为研究战国时期区域文化交流、邦交关系的关键物证，为揭开寿县楚文化融汇多元的特质提供了重要线索。由于目前缺乏对该剑的深入研究，故写此篇抛砖引玉，以期更多关注，使得古剑重光。

一、剑器形制与工艺：越国青铜剑的典范之作

(一)与越王勾践剑的同源性

这柄暗花纹嵌松石剑，在形制与工艺上与越王勾践剑有着高度的契合。越王勾践剑作为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剑的巅峰之作，以千年不锈的剑身、精美的鸟虫书铭文和精湛的铸造工艺闻名于世。而寿县出土的这柄剑，同样展现出越国剑的核心特征：剑身修长挺拔，线条流畅，适合刺击的功能设计尽显吴越兵器的灵动风格；剑格镶嵌绿松石的装饰手法，与越王勾践剑剑格的绿松石镶嵌如出一辙，彰显出使用者的尊贵身份；剑身满饰的菱格纹，历经千年依然清晰艳丽，这种工艺正是越国剑防止锈蚀、提升美观度的独特秘技，与越王勾践剑的菱形暗格花纹工艺一脉相承。

从铸造工艺来看，此剑同样遵循了越国剑“内外兼修”的用料原则，铜、锡、铅的配比精准，杂质含量极低，保证了剑身的硬度与韧性平衡。这种对材料的极致追求，与越王勾践剑所采用的上乘用料标准完全一致，进一步印证了二者同属越国王室宝剑的可能性。结合剑器的战国时代背景，以及越国在战国时期的王室传承，可推断这柄剑可能为越国王室成员的佩剑，是越国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代表。

(二)战国越国剑的工艺传承与发展

进入战国时期，越国的青铜剑工艺在继承春秋传统的基础上，又有了新的发展。寿县这柄剑的漆木剑鞘保存完好，鞘身的髹漆工艺细腻，色泽沉稳，体现了战国时期越国在兵器配套工艺上的进步。与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剑相比，这柄剑的菱格纹布局更为规整，镶嵌的绿松石纹样也更具层次感，反映出越国工匠在装饰工艺上的精益求精。同时，剑器整体保存状态极佳，历经两千余年仍锋芒犹存，再次证明了越国剑在防锈技术上的成熟与高超。这种技术不仅是实用需求的满足，更是越国对兵器美学与耐久性双重追求的体现。

二、剑出楚地：吴楚联姻与文化融汇的历史见证

(一)战国时期吴楚联姻的历史背景

春秋至战国时期，吴楚两国的关系始终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摇摆。两国地理位置相邻，边界争端与领土冲突频发，伍子胥奔吴、吴师入郢等事件更是将两国矛盾推向顶峰。但在长期的对峙博弈中，双方也逐渐意识到邦交与联姻的重要性。联姻作为春秋至战国时期诸侯国巩固政治联盟的重要手段，在吴楚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。

春秋时期，吴楚两国君主便常以联姻维系政治联系，吴国公主嫁入楚国王室、楚国贵族女子成为吴国后宫成员的记载屡见不鲜。到了战国时期，随着越国灭吴，原吴国势力范围被越国接管，而楚国为了稳定江淮地区局势，与越国延续了类似的联姻传统。越国王室女子嫁入楚国王族，或楚国贵族迎娶越国宗室女，成为两国缓和矛盾、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。这种联姻不仅是政治上的结盟，更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，推动了吴越文化与楚文化的深度融合。

(二)联姻背景下越国剑入楚的路径

寿县出土的这柄越国王室宝剑，极有可能是通过联姻陪嫁的方式流入楚地。在战国时期的联姻制度中，陪嫁品不仅包括金银珠宝、丝织品等财物，还常包含象征身份与权力的兵器。越国王室将象征尊贵身份的青铜剑作为陪嫁，既彰显了对联姻的重视，也向楚国展示了越国的工艺实力。

此外，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馈赠也是越国剑入楚的可能路径。越国为了寻求楚国的支持，或楚国为了笼络越国，常以珍贵礼物相互馈赠。越国王室宝剑作为工艺精湛的国之重器，自然成为馈赠的首选。无论是陪嫁还是馈赠，这柄剑最终随着文化交流的浪潮进入楚地，成为楚地贵族的珍藏，而后长眠于寿县的楚墓之中。

(三)寿县楚文化的多元融汇特质

寿县作为战国晚期楚国的都城寿春所在地，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中心。楚国东进江淮的过程中，与群舒、州来、淮夷以及吴、越、蔡等国长期对峙博弈，客观上促进了区域文化的碰撞交融。这柄越国剑的出土，正是寿县楚文化融汇吴越文化的直接物证。

在寿县的考古发掘中，类似的跨区域文化遗存并不鲜见。1996年出土于寿县西圈遗址的越王者旨於賜剑，剑格上的鸟篆文明确其为越王勾践之子的佩剑，入葬蔡国贵族墓的事实，反映了越蔡两国的友好关系，也从侧面印证了楚地与吴越地区的密切往来。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藏的700余件涉楚文物中，既有体现楚地礼制的青铜重器，也有融入吴越工艺的兵器、玉器，充分展现了楚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。

这种文化融汇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，也可能渗透到精神文化领域。楚人吸收了吴越的海洋文化特质，使得楚文化中既有中原文化的理性，又有吴越文化的灵动；老庄哲学中对自然的崇尚，与吴越文化中对天地的敬畏相互交融，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精神内核。

三、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：对现代寿县文化的深远影响

(一)构建寿县文化认同的核心纽带

这柄战国暗花纹嵌松石剑，应当成为寿县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。它所承载的多元文化记忆，让寿县人民深刻认识到本地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。在现代寿县的文化建设中，这柄剑的形象可以出现在各类文化活动、文创产品中，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。例如，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可以围绕这柄剑开发系列文创产品，不仅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战国青铜剑的魅力，更通过产品的传播，将寿县的多元文化特质传递给更多人，增强寿县人民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。

(二)推动区域文化交流与发展

寿县楚文化的多元融汇特质，为现代寿县的区域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借鉴。在当今社会，寿县依托自身丰富的楚文化资源，积极与周边地区开展文化交流合作。例如，可以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合举办吴越楚文化展，通过展示两地的文物遗存，共同探讨吴越楚文化的交流历程，促进区域文化的互动与发展。同时，寿县还可以利用这柄越国剑的历史价值，打造文化旅游品牌，吸引游客前来探寻楚文化的奥秘，带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，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。

(三)传承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

这柄越国剑所代表的吴楚文化交流历史，蕴含着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。在现代社会，这种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寿县在城市发展过程中，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，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，同时大力弘扬本地的传统文化，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文化风貌。例如，寿县在城市建设中，既保留了古城墙、楚文化博物馆等历史文化遗迹，又建设了现代化的文化场馆、商业街区，实现了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生。这种发展模式正是对吴楚文化交流中开放包容精神的当代传承。

结语

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藏的这柄战国暗花纹嵌松石剑，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青铜艺术品，更是一部浓缩的战国区域文化交流史。它与越王勾践剑的同源性，见证了越国青铜工艺的卓越成就；它在楚地寿县的出土，揭示了战国时期吴楚联姻与文化融汇的复杂脉络；而它对现代寿县文化的影响，则展现了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独特价值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这柄剑跨越了国界与时空，成为连接吴越楚文化的重要纽带，也为我们理解寿县楚文化的多元性与融汇度提供了珍贵的视角。它提醒着我们，文化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交流与融合，而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，将继续推动寿县文化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